

DOI: 10.19361/j.er.2016.03.10

社会保障支出、地区差异与居民幸福感

殷金朋 赵春玲 贾占标 倪志良^{*}

摘要:本文从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和社会保障水平两方面分析了中国社会保障支出的地区差异特征,并结合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实证研究了社会保障支出及其地区差异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保障支出、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和社会保险基金支出人均值的提高均有利于居民幸福感的提升,但人均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抑制了居民幸福感的提升;除财政社会保障水平外,其他各项社会保障水平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均存在U型关系。人均社会保障支出的省际差异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存在三次项非线性关系,三区域人均值的地区差异则呈现倒U型关系;社会保障水平省际差异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存在U型关系,而三区域社会保障水平地区差异有利于居民幸福感的提升。社会保障支出规模与社会保障水平对居民幸福感的复杂作用路径加大了政策制定和执行的难度。

关键词:社会保障支出;地区差异;居民幸福感;泰尔指数

一、引言

政府行为和制度安排的最终目的在于提升居民幸福感,研究政府公共支出与民生幸福无疑是重要的(Helliwell and Huang, 2008; Hessami, 2010; Frey and Gallus, 2013),而公共财政及民生领域的一个核心议题就是社会保障。社会保障制度是保障和改善民生、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和谐稳定的基本社会架构安排(王延中、龙玉其,2011)。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明确提出,“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尽管中国当前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已基本形成,但社会保障支出的地区差异仍然十分显著(彭海艳,2007;徐倩、李放,2012;巴曙松等,2013),对居民幸福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13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显示,36.07%的居民认为社会保障^①是目前政府

*殷金朋,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300071,电子信箱:yjp1006@163.com;赵春玲,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邮政编码:300071,电子信箱:chunlingz@163.com;贾占标,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300071,电子信箱:jiazhansbiao1988@126.com;倪志良,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邮政编码:300071,电子信箱:nizhiliang6886@163.com。

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和谐社会视野下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与共享研究”(项目编号:11BK031)、天津市社科基金项目“适时提高我国县级财政占比研究”(项目编号:TJYY11-1-008)、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旨于提升国民幸福的公共支出优化研究”(项目编号:68150003)的资助。本文数据得到了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项目组的支持,特此致谢。本文特别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和编辑部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①按照本文统计口径,将问卷中的“社会保障”、“低保,灾害、流浪乞讨、残疾、孤儿救助,基本养老,婚姻登记、殡葬等基本社会服务”、“医疗卫生”、“劳动就业”等内容均纳入社会保障予以考察。

最为亟需改进的基本公共服务。那么,中国社会保障支出的地区差异到底有多大?作为民生支出的主要方面是否真正提升了居民幸福感?社会保障支出地区差异对居民幸福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与回答,对于优化社会保障支出的地区结构,更好地发挥社会保障提升居民幸福感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此,本文在测算中国社会保障支出泰尔指数的基础上,结合 CGSS2013 微观数据,采用有序 Probit 及双变量有序 Probit 等模型考察社会保障支出及其地区差异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二、文献述评

自 Easterlin(1974)在经济学领域开创性地提出“幸福-收入悖论”(happiness-income paradox)以来,关于幸福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得到了迅猛发展,这些研究侧重于检验幸福的影响因素,如收入、就业、通货膨胀、社会资本、环境污染及诸如性别、年龄、民族、宗教信仰、户籍、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等表征个体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特征(Clark and Oswald, 1996; Frey and Stutzer, 2002; Diener and Seligman, 2004; Kimball et al., 2015)。就政府行为而言,国外学者主要沿循政府治理水平和公共支出规模两条逻辑主线进行研究(Dolan et al., 2008; Malesevic Perovic and Golem, 2010; Ott, 2011)。然而,关于社会保障与居民幸福感的研究多分散于以上议题中(Fuster, 2003; Di Tella and MacCulloch, 2006; Helliwell et al., 2014),从社会保障支出角度独立考察对居民幸福感影响的文献并不多见。

Ouweneel(2002)运用 1990 年 42 个国家的数据发现,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对失业津贴受益者的主观幸福感提升作用微乎其微,失业者和就业者之间的主观幸福感差距并未因为失业保障支出的增加而缩小。Börsch-Supan 和 Jürges(2006)基于德国 GSOEP 数据发现,两个年龄组(25~49 岁和 55 岁以上)的居民幸福感在 1984 年以后随着社会保障支出的下降而下降。Hessami(2010)通过对 1990~2000 年间欧盟 12 个国家的研究发现,社会保障支出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倒 U 型关系,而与医疗卫生支出呈 U 型关系。Kotakorpi 和 Laamanen(2010)研究发现,相对较高的公共医疗卫生支出有助于提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而且中等收入群体较低收入和高收入群体偏好更高的公共医疗支出。随着中国相关数据资料的丰富,近年来有关中国社会保障支出与居民幸福感的研究也逐步展开。谢舜等(2012)、胡洪曙和鲁元平(2012)等利用不同的数据库研究公共支出结构时均发现,医疗卫生支出和社会保障补助支出显著提升了居民幸福感。而汤凤林和雷鹏飞(2014)基于 CGSS2008 数据得到了不同的结论,认为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微弱降低了居民主观幸福感,这可能由政府缺乏效率以及公众需求弹性的差异引起,但社会保障通过缩小收入差距间接地提高了居民幸福感。

尽管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社会保障支出及其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但就社会保障支出的地区差异而言,大多数研究局限于财政性社会保障支出的窄口径,这并不能充分考察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而独立地讨论社会保障支出及其地区差异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更是匮乏。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首先在宽口径社会保障支出的基础上,从省际和东中西三区域两个划分维度下捕捉社会保障支出地区差异特征;其次,将社会保障支出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侧重检验分析社会保障支出及其地区差异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三、数据说明、变量测度与模型设定

(一) 社会保障支出统计口径的界定

准确界定社会保障支出是量化研究的前提。从既有研究来看,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作为社会保障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毋庸置疑的,存在分歧的是医疗卫生支出和社会保险基金支出。本文认为医疗卫生支出和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应纳入社会保障支出统计范畴,原因在于:医疗卫生支出是关系全民健康水平和家庭幸福的重大民生问题,具有强外部性和非排他性,需要政府的直接干预,以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政府扮演着组织者或领导者角色(杨燕绥,2011)。因此,将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和社会保险基金支出纳入分析框架,有利于更加全面地评估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本文采用的社会保障支出统计指标即为财政社会保障支出、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和社会保险基金支出的加总值。

(二) 地区差异的测算

社会保障支出的地区差异采用 Shorrocks (1980) 及王少平和欧阳志刚 (2007) 提出的泰尔指数计算公式(1)来测算,其中 i 和 j 分别表示省份和地区, SS 和 P 分别表示社会保障支出和年末人口数。为保证研究的严谨性,我们将从人均社会保障支出与社会保障水平两个视角分析社会保障支出的地区差异。

$$theil_i = \sum_i \left(\frac{SS_i}{SS} \right) \ln \left(\frac{\frac{SS_i}{SS}}{\frac{P_i}{P}} \right) = \sum_j \sum_i \left(\left(\frac{SS_j}{SS} \right) \left(\frac{SS_{ji}}{SS_j} \right) \ln \left(\frac{\frac{SS_{ji}}{SS_j}}{\frac{P_{ji}}{P_j}} \right) \right) + \sum_j \left(\frac{SS_j}{SS} \right) \ln \left(\frac{\frac{SS_j}{SS}}{\frac{P_j}{P}} \right) \quad (1)$$

根据公式(1)计算得到 2013 年中国大陆省际及三区域^①的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及社会保障水平的泰尔指数,利用 ArcGIS 地理信息软件分别绘制了 2013 年中国各省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和社会保障水平的空间分布图(如图 1)。可以看出,无论是人均社会保障支出还是社会保障水平,中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且差异较大的省份主要分布于东部和西部地区,中部地区最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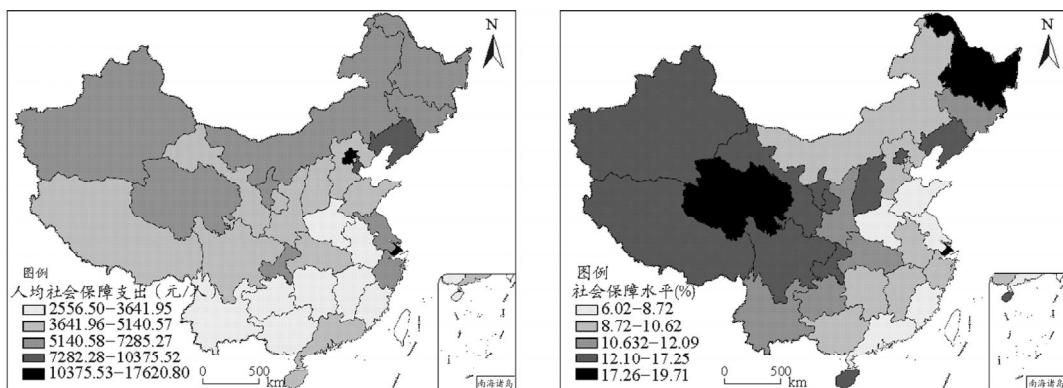


图 1 2013 年中国各省份社会保障支出地区差异

^①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为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为内蒙古、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西藏。

(三)模型设定、变量选择及描述性统计

为探析社会保障支出及其地区差异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我们参照并扩展 Malesevic Perovic 和 Golem(2010)以及 Hessami(2010)的相关模型,将模型设定如下:

$$H_{ij} = \alpha + \beta Security_j + \gamma Individual_{ij} + \lambda Macro_j + \varepsilon_{ij} \quad (2)$$

(2)式中: i, j 分别表示被调查个体和地区, H 表示自陈主观幸福感 (reported subjective happiness)。学术界已经广泛接受了将自陈主观幸福感作为衡量个人福利水平的有效指标 (Frey and Stutzer, 2007; Ferrer-i-Carbonell and Ramos, 2014), 本文也采用这个指标来量化居民幸福感。数据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中 2013 年的相关调查。在 CGSS2013 问卷中对应的问题是:“总的来说,您认为您的生活是否幸福?”在剔除 CGSS2013 中的拒绝回答、不适用及不知道等缺失值后,最终进入实际分析样本的个体为 2 365 个,其中非常幸福占比 13.12%,比较幸福占比 59.92%,一般占比 20.21%,比较不幸福占比 5.75%,非常不幸福占比 0.80%。

核心解释变量 (*Security*) 为人均社会保障支出、社会保障水平 (社会保障支出规模占 GDP 的比重) 或其地区差异。控制变量选取个体社会学特征变量 (*Individual*) 及相关宏观变量 (*Macro*)。个体变量主要选取了性别、年龄、民族、宗教信仰、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工作性质、收入情况等 (Ferrer-i-Carbonell and Frijters, 2004); 宏观经济变量包括人均 GDP、房价和城镇化水平 (Di Tella and MacCulloch, 2006; 林江等, 2012)。 ε 为模型随机扰动项。

鉴于主观幸福感及个体特征数据的有序 (Ordinal) 特征,本文主要采用 Ordered Probit 估计。需要指出的是,主观幸福感是人们对自身一段时间内情绪、认知和行为的综合评价,受到前期条件和公共服务等影响,因此宏观数据采用了 2012 年的数据,其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等。为控制异常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在 1% 和 99% 分位数上进行了 Winsorize 处理。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主要变量含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主观幸福感 (H : 非常不幸福=1, 比较不幸福=2, 一般=3, 比较幸福=4, 非常幸福=5)	3.792	0.771	1	5
自变量	人均社会保障支出 ($rass$, 元)	8 005.06	4 984.75	2 556.51	17 620.79
	人均财政社会保障支出 ($rfss$, 元)	1 281.24	568.84	637.67	2 803.93
	人均财政医疗卫生支出 ($rhss$, 元)	721.79	250.62	496.72	1 305.69
	人均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riss$, 元)	3 361.91	2 257.03	900.61	7 841.50
	社会保障支出水平 ($gass$)	0.1259	0.0412	0.0609	0.1970
	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水平 ($gfss$)	0.0229	0.0105	0.0106	0.0771
控制变量	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水平 ($ghss$)	0.0131	0.0052	0.0080	0.0327
	社会保险基金支出水平 ($giss$)	0.0515	0.0184	0.0249	0.0877
	人均社会保障支出的泰尔指数 (r_theil)	0.0067	0.0125	-0.0095	0.0328
	社会保障水平的泰尔指数 (g_theil)	0.0035	0.0131	-0.0116	0.0529
	性别 ($gender$: 男=1, 女=0)	0.5928	0.4914	0	1
	年龄 (age)	41.59	11.00	19	83
	年龄的平方 (age^2)	1 850.37	968.97	361	6 889
	自评健康水平 ($health$: 很不健康=1, 比较不健康=2, 一般=3, 比较健康=4, 很健康=5)	4.1222	0.8359	1	5
	民族 ($nation$: 汉族=1, 其他=0)	0.9488	0.2204	0	1
	宗教信仰 ($religion$: 信仰宗教=1, 不信仰宗教=0)	0.9154	0.2783	0	1
	政治身份 ($politic$: 中共党员=1, 群众/共青团员/民主党派/其他=0)	0.1535	0.3605	0	1

续表 1 主要变量含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控制变量	户籍类型(<i>hukou</i> : 非农业户口/居民户口/蓝印户口/军籍=1, 农业户口/没有户口/其他=0)	0.6934	0.4612	0	1
	婚姻状况(<i>marriage</i> : 初婚有配偶/再婚有配偶=1, 分居未离婚/离婚/丧偶/同居/未婚等=0)	0.7928	0.4054	0	1
	教育程度(<i>education</i> : 大学专科(成人高等教育)及以上=1, 中专/技校/普通高中/职业高中/初中及以下=0)	0.4076	0.4915	0	1
	工作单位性质(<i>owner</i> : 集体所有或集体控股/国有或国有控股=1, 私有/民营或私有/民营控股/港澳台资或港澳台资控股/外资所有或外资控股/其他=0)	0.4816	0.4998	0	1
	绝对收入水平(<i>abincome</i> : 全年家庭总收入/家庭人口数的对数值)	4.3664	0.3603	2.6021	5.9542
	相对收入水平(<i>reincome</i> : 远低于平均水平=1, 低于平均水平=2, 平均水平=3, 高于平均水平=4, 远高于平均水平=5)	2.8414	0.6311	1	5
	人均GDP(<i>rgdp</i> , 元)	61 066.99	24 437.58	22 862.04	97 609.45
	房价(<i>houpri</i> : 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 元)	8 655.46	5 026.78	3 886.00	18 553.00
	城镇化水平(<i>urban</i> , %)	63.96	16.22	37.83	89.60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表2报告了人均社会保障支出、社会保障水平及各分项支出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回归结果。为便于比较, 表中同时给出了OLS和Ordered Probit的计量结果。

表2 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幸福感影响的回归结果

	r-var				g-var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OLS	Ordered Probit	OLS	Ordered Probit	OLS	Ordered Probit	OLS	Ordered Probit
rass	4.3e-5 *** (1.0e-5)	6.8e-5 *** (1.6e-5)						
rfss			5.7e-5 ** (2.6e-5)	8.6e-5 ** (3.0e-5)				
rhss			-2.2e-4 * (1.2e-4)	-4.0e-4 ** (2.0e-4)				
riss			1.1e-4 *** (2.4e-5)	1.8e-4 *** (3.7e-5)				
gass					-11.25 ** (3.38)	-20.13 *** (5.33)		
gass ²					53.37 *** (13.19)	93.60 *** (20.77)	2.90 (2.10)	4.53 (3.23)
gfss							-45.31 *** (19.48)	-88.83 *** (29.94)
ghss							1024.13 ** (523.27)	2065.79 *** (799.78)
ghss ²							-18.58 *** (6.69)	-34.15 *** (10.63)
giss							242.24 *** (61.65)	427.80 *** (98.34)
giss ²								

续表 2 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幸福感影响的回归结果

	r-var				g-var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OLS	Ordered Probit	OLS	Ordered Probit	OLS	Ordered Probit	OLS	Ordered Probit
gender	-0.058 * (0.031)	-0.094 * (0.048)	-0.057 * (0.031)	-0.092 * (0.048)	-0.054 * (0.031)	-0.089 * (0.048)	-0.055 * (0.031)	-0.090 * (0.048)
age	-0.043 *** (0.010)	-0.062 *** (0.015)	-0.042 *** (0.010)	-0.061 *** (0.015)	-0.044 *** (0.010)	-0.063 *** (0.015)	-0.042 *** (0.010)	-0.061 *** (0.015)
age ²	4.1e-4 *** (1.1e-4)	0.001 *** (1.7e-4)	4.0e-4 *** (1.1e-4)	0.001 *** (1.7e-4)	4.2e-4 *** (1.1e-4)	6.1e-4 *** (1.7e-4)	4.0e-4 *** (1.1e-4)	5.9e-4 *** (1.7e-4)
health	0.121 *** (0.021)	0.198 *** (0.031)	0.122 *** (0.021)	0.199 *** (0.031)	0.121 *** (0.021)	0.199 *** (0.031)	0.123 *** (0.021)	0.203 *** (0.031)
nation	-0.057 (0.081)	-0.147 (0.126)	-0.057 (0.081)	-0.148 (0.126)	-0.097 (0.082)	-0.216 * (0.128)	-0.085 (0.081)	-0.196 (0.127)
religion	-0.174 ** (0.056)	-0.298 ** (0.090)	-0.179 ** (0.055)	-0.306 ** (0.090)	-0.146 ** (0.056)	-0.252 ** (0.091)	-0.163 ** (0.055)	-0.282 ** (0.090)
politic	0.149 *** (0.042)	0.229 ** (0.068)	0.146 ** (0.042)	0.225 ** (0.068)	0.141 ** (0.042)	0.218 ** (0.068)	0.137 ** (0.042)	0.211 ** (0.068)
hukou	0.009 (0.037)	0.023 (0.057)	0.009 (0.037)	0.024 (0.057)	0.011 (0.037)	0.028 (0.057)	0.011 (0.037)	0.027 (0.057)
marriage	0.332 *** (0.050)	0.466 *** (0.072)	0.332 *** (0.050)	0.466 *** (0.072)	0.335 *** (0.049)	0.473 *** (0.072)	0.336 *** (0.050)	0.476 *** (0.072)
education	-0.060 (0.036)	-0.102 * (0.057)	-0.062 (0.036)	-0.105 * (0.057)	-0.059 (0.036)	-0.102 * (0.057)	-0.061 (0.036)	-0.106 * (0.057)
owner	0.057 * (0.032)	0.102 ** (0.050)	0.058 * (0.032)	0.105 ** (0.050)	0.058 ** (0.032)	0.105 ** (0.050)	0.060 ** (0.032)	0.108 ** (0.050)
abincome	0.141 ** (0.054)	0.234 ** (0.084)	0.139 ** (0.054)	0.233 ** (0.084)	0.115 ** (0.053)	0.190 ** (0.084)	0.124 ** (0.054)	0.206 ** (0.084)
reincome	0.241 *** (0.029)	0.358 *** (0.044)	0.241 *** (0.029)	0.358 *** (0.044)	0.246 *** (0.028)	0.367 *** (0.044)	0.243 *** (0.028)	0.362 *** (0.044)
rgdp	7.5e-6 ** (2.3e-6)	1.1e-5 ** (3.6e-6)	7.4e-6 ** (2.3e-6)	1.1e-5 ** (3.5e-6)	1.5e-5 ** (3.0e-6)	2.3e-5 *** (4.5e-6)	1.6e-5 *** (3.0e-6)	2.5e-5 *** (4.7e-6)
houpri	3.7e-5 ** (7.0e-6)	2.9e-5 *** (5.1e-6)	1.1e-5 *** (5.7e-6)	4.4e-5 ** (6.1e-6)	1.1e-5 * (6.3e-6)	1.6e-5 * (7.7e-6)	3.1e-5 ** (6.4e-6)	5.6e-5 ** (10.0e-6)
urban	-0.025 *** (0.005)	-0.039 *** (0.008)	-0.026 *** (0.005)	-0.040 *** (0.008)	-0.030 *** (0.005)	-0.048 *** (0.009)	-0.033 *** (0.006)	-0.052 *** (0.009)
Adjust-R ²	0.1346		0.1362		0.1404		0.1415	
Pseudo-R ²		0.0639		0.0649		0.0676		0.0682
Log-pseudo		-2438.63		-2436.25		-2428.98		-2427.50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 ***、**、* 分别表示在 1%、5% 及 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模型 1 显示人均社会保障支出的系数在 1% 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 表明社会保障支出对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模型 2 显示人均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和人均社会保险基金支出的正向影响显著, 表明二者有利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 而人均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显著为负值, 即不利于居民主观幸福感。模型 3 和模型 4 所考察的社会保障水平显示, 除财政社会保障水平不显著外, 其他表征社会保障水平的变量均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呈现 U 型关系。

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是多方面的。首先, 社会保障支出主要来自于税收或是从当期工资额中扣除, 而这直接影响居民当期可支配资源, 减少了产生舒适感

和愉悦感的防御性消费和创造性消费^①(Scitovsky, 1972; 陈炜等, 2014), 这必然带来由以上两种消费兴奋产生的积极情绪占比的下降(于席正、江莉莉, 2012), 进而降低居民幸福感。其次, 居民作为理性人将权衡短期损失和长期收益, 预期政府能够为其所缴纳的税费提供一个较为安全的保障和长期收益, 从而忍受跨期消费带来的痛苦。但这种为增加长期收益而减少短期体验性消费享乐的认知和行为将显著提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Kahneman and Wakker, 1997)。第三, 社会保障制度自身所具有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预期, 减弱了个体间的相对收入差距, 释放了私人消费需求(何立新、佐藤宏, 2008), 进而强化了大脑中组成情绪、认知和行为的幸福回路。表 2 中, 社会保障支出、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及社会保险基金支出的人均值对居民幸福感的正向作用均表明,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的后两种效用(增加长期收益和减小相对收入差距) 更为明显。

就财政医疗卫生支出而言,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落实理应有利于居民幸福感的提升(进一步的研究证实了该结论^②), 但实证结果却显示其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可能源于多个原因。一方面, 虽然医疗卫生支出在总量上有所增长, 但同比增长速度在 2011 年后陡降, 从 34.41% 下降为 2013 年的 14.40%, 低于财政支出平均增速 18.34%。而这与 2009 年公布的“新医改”中“政府卫生投入增长幅度要高于经常性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 使政府卫生投入占经常性财政支出的比重逐步提高”相悖。同时, 老龄化加剧及医疗技术发展等快速释放的医疗需求以及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 造成大城市的一些大医院始终处于“战时状态”, 人满为患。这种医疗保障供求结构间的矛盾显然不利于居民幸福感的总体提升。另一方面, 近年来, 医患关系紧张、医疗纠纷多发, 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2014)》的调查结果显示, 59.79% 的医务人员受到过语言暴力, 13.07% 的医务人员受到过身体伤害, 仅有 27.14% 的医务人员未遭遇过暴力事件。医务人员认为较之行业竞争和职业发展的压力, 这种执业环境带来的压力更让他们难以适从。这不仅降低了医务人员自身的成就感和幸福感, 也从整个社会认知层面削弱了居民的幸福感知。

就社会保障水平而言, 本文通过计算得到社会保障总体水平、财政医疗卫生水平及社会保障基金支出水平的拐点分别为 0.1054、0.0214 和 0.0399。比对 2013 年各项目的全国均值 (0.1263、0.0171、0.0478) 可发现, 提高当前我国的社会保障总体水平和社会保障基金支出水平, 有利于提升居民幸福感^③; 而财政医疗卫生水平却在拐点的左端下降区域, 即现阶段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对民生幸福的提升作用微弱, 与人均医疗卫生支出的实证结果一致。

此外, 上述模型中个体变量与宏观变量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方向及显著性与大多数的

^① 防御性消费 (defensive consumption) 主要指满足人类自然及直接的基本需求, 缓解不适和疼痛, 产生舒适感 (comfort) 的消费活动; 创造性消费 (creative consumption) 指通过扩展和深化个人的知识和体验, 增强日常生活满意度, 产生愉悦感 (pleasure) 的消费活动。

^② CGSS2013 有如下问题: 您觉得目前医疗卫生公共服务提供的服务资源是否充足以及在不同地域间的分配是否均衡。我们用其置换财政医疗支出得到的结果均在 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 (0.1434 [0.0336]; 0.0765 [0.0424])。

^③ 前文中, 根据公式(1)测算得到 2013 年中国的社会保障总体水平、财政医疗卫生水平及社会保障基金支出水平, 进一步计算得到它们的均值, 分别为 0.1263、0.0171、0.0478。显然, 社会保障总体水平与社会保障基金支出水平位于 U 型曲线的右侧, 即超过了其对应的拐点, 进入到了上升区域。

研究基本一致。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其中值得关注的几点如下:宗教信仰与居民幸福感存在负相关关系,这与刘斌等(2012)及 Hayward 和 Elliott(2014)的结论一致。我们利用社会保障支出与宗教信仰组成的交互项为变量作进一步的分析得到,在 10% 的统计水平下影响系数显著为负^①,证实了宗教与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功能具有一定意义上的替代性(郑风田等,2010)。受教育程度的反向关系可能与样本的选取有关,从统计描述可以看出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数仅占样本的 40% 左右。房价的估计系数与人们的直觉并不一致,但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虽然近年来商品房的平均销售价格一直上涨,但在 2003—2013 年间,其涨幅度仅高出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化幅度 2.17 个百分点^②。并且房价收入比自 2009 年一直处于下降趋势,从 6.59 降至 2013 年的 5.83,进入国际公认的 4~6 的合理范围。此外,随着小产权住房和保障房市场的不断规范将进一步提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李涛等,2011)。城镇化水平的估计结果为负,对此,我们认为中国虽然进入了城镇化改革的快通道,但农村居民还未真正“同步市民化”地融入城市的经济社会生活,进城农民在经济社会地位和心理认知上尚未真正实现市民化,相应的就业、医疗和养老保险等社会福利没有落实^③,存在显著的“不平等城镇化效应”(蔡昉,2001;陈云松、张翼,2015),而这将明显影响进城农民和城镇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

(二) 社会保障支出地区差异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表 3 给出了社会保障支出的省际和三区域内部地区差异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 Ordered Probit 结果。模型 1 结果显示人均社会保障支出省际差异(r_{theil})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存在三次项非线性关系,通过 R 软件编程计算得该一元三次方程的实根为 0.0637。就数值而言,在同样的幸福水平下,2013 年各省均未达到该拐点,居民可以容忍的省际差异处于较大的区间内。但它对幸福感的作用区域并不好确定,这也给政策的制定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模型 2 结果表明三区域内部地区差异(r_{theil3})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存在倒 U 型关系。比对现实数据,我们发现 2013 年的地区内差异为 0.0384,略高于拐点(0.0382),说明当前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地区差异开始转向抑制居民幸福感的提升。模型 3 结果显示社会保障水平的省际差异(g_{theil})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存在 U 型关系,对应的拐点值 0.1272 要小于 2013 年的 0.1742,说明当前社会保障水平的省际差异有利于居民幸福感的提升。模型 4 显示,三区域内社会保障水平地区内差异(g_{theil3})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即当前的地区经济资源对社会保障的倾斜有利于提升居民幸福感。

显然,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和社会保障水平所显示的地区差异沿着不同的路径作用于居民幸福感。从拐点值上看,人们对前者的容忍程度更强一些,对小区域也有更强的容忍度。究其原因,在拐点之前,较好的社会保障作为制度激励,不断吸引优秀人群的流入,促成人生意义感的实现;此外,人们更为关注优质公共产品的提供等非物质因素,产生了心理和认知上的攀比效应,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辖区内居民的幸福感(Dinner and Seligman, 2004; 何强,

^① 该交叉项的 t 值为 -1.92, 标准差为 $-1.86e-5$ 。

^②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③ 张展新等(2007)论证了本地人口、外来市民和外来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可能性依次递减的现象;陈云松和张翼(2015)最新研究指出,城镇化虽然提高了全体居民的社会保险水平,但其对城镇户籍带来的社会保险参与率的提升效应是进城农民的 3 倍。

2011)。而在拐点之后,人们追寻更为刺激的幸福参考点,比如将参考点放置在更大区域内比较等,陷入“享乐水车”的恶性循环,进入福利陷阱,进而损害居民主观幸福感(Brickman and Campbell, 1971; Kahneman and Krueger, 2006)。此外,控制变量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基本未发生变化,不再赘述。

表 3 社会保障支出地区差异对居民幸福感影响的回归结果

	<i>r</i> -var		<i>g</i> -var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i>theil</i>	30.45 *** (6.68)		-9.63 ** (4.71)	
<i>theil</i> ²	-2280.46 *** (635.33)		37.84 ** (17.25)	
<i>theil</i> ³	66748.96 *** (16435.57)			
<i>theil</i> ³		211.40 ** (79.93)		1.01 ** (0.51)
<i>theil</i> ³ ²		-2768.01 ** (1056.94)		
<i>gender</i>	-0.085 * (0.048)	-0.102 ** (0.048)	-0.095 ** (0.048)	-0.102 ** (0.048)
<i>age</i>	-0.061 *** (0.015)	-0.064 *** (0.015)	-0.065 *** (0.015)	-0.064 *** (0.015)
<i>age</i> ²	5.8e-4 *** (1.7e-4)	6.3e-4 *** (1.6e-4)	6.4e-4 *** (1.7e-4)	6.3e-4 *** (1.6e-4)
<i>health</i>	0.204 ***	0.201 ***	0.198 ***	0.201 ***
<i>nation</i>	-0.168	-0.194	-0.170	-0.190
<i>religion</i>	(0.128)	(0.125)	(0.126)	(0.125)
<i>politic</i>	-0.304 ** (0.090)	-0.225 ** (0.090)	-0.243 ** (0.090)	-0.226 ** (0.090)
<i>hukou</i>	0.204 ** (0.068)	0.228 ** (0.068)	0.234 ** (0.068)	0.228 ** (0.068)
<i>marriage</i>	0.029 ***	0.039 ***	0.019 ***	0.037 ***
<i>education</i>	-0.098 * (0.057)	-0.073 ***	-0.070 ***	-0.074 ***
<i>owner</i>	0.122 ** (0.050)	0.104 ** (0.050)	0.098 ** (0.050)	0.103 ** (0.050)
<i>abincome</i>	0.158 * (0.086)	0.176 ** (0.084)	0.217 ** (0.084)	0.177 ** (0.084)
<i>reincome</i>	0.375 *** (0.044)	0.359 *** (0.044)	0.360 *** (0.043)	0.360 *** (0.044)
<i>rgdp</i>	1.4e-5 *** (4.0e-6)	1.4e-5 *** (4.1e-6)	8.7e-6 ** (3.7e-6)	2.0e-6 * (6.7e-6)
<i>houpri</i>	2.2e-5 * (1.2e-5)	2.6e-5 ** (9.7e-6)	2.7e-5 ** (9.6e-6)	2.5e-5 ** (9.7e-6)
<i>urban</i>	-0.043 *** (0.008)	-0.013 ** (0.0069)	-0.025 ** (0.008)	-0.013 * (0.007)
Pseudo- <i>R</i> ²	0.0711	0.0606	0.0609	0.0605
Log-pseudo	-2 420.05	-2 447.43	-2 446.56	-2 447.49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 ***、**、* 分别表示在 1%、5% 及 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三) 内生性问题

居民幸福感与社会保障支出及其地区差异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这种情况下一般诉诸于工具变量法。但当被解释变量和自变量均涉及离散数据类型时,标准工具变量技术

经常失效并需要更为复杂的分析技术,而双变量有序 Probit 估计是无偏且有效的,并能够有效地克服内生性问题(Sajaia, 2008; Franz and Anna, 2014),该方法已得到广泛应用(Greene and Hensher, 2010; 王海成、郭敏, 2015)。因此,本文也采用该方法来解决内生性问题。

在考虑数据完整性基础上,我们一方面借鉴社会保障研究领域将地区参保率作为工具变量的惯常做法(潘杰等,2013;周钦等,2015),选取能够表征社会保障覆盖率和地区差异度的公共服务充足程度(*disequil*)及公共服务分布均衡度(*dissuffi*)^①的均值分别作为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及其地区差异的工具变量。显然,公共服务充足度和分布均衡度直接反映了社会保障支出的普及程度和资源分配的均衡程度,而且地区社会保障覆盖率与模型扰动项不直接相关(Lei and Lin, 2009)。另一方面,借鉴 Ashraf 和 Galor(2013) 及孙三百等(2014)选取历史数据作工具变量的思路,采用 1997 年度人均 GDP(*rgdp97*)作为社会保障水平及其地区差异的工具变量。这是因为社会保障支出与人均 GDP 直接相关,由于社会保障支出的增长惯性及刚性预期,其与人均 GDP 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同时受限于个体认知能力和有限理性等因素,居民关注更多的是便于参照的、更小的互动空间(Clark and Shields, 2008),而非时间轴和空间位置更远的距离,因此该变量不会直接影响 2013 年居民幸福感的感知和评价。

表 4 和表 5 分别报告了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和社会保障水平对居民幸福感的 Bioprobit 估计结果^②。可以看到,所选取工具变量的系数值在大多数情况下均显著,且相应的内生性检验辅助参数 *atanhrho_12* 在 10% 的统计水平上也显著,因此大部分模型拒绝社会保障支出及其地区差异为外生变量的假设,而且比较发现,各变量的估计系数符号及显著性与上文结果基本一致;而接受原假设的方程(表 5 中模型 3 和模型 4)则转向有序 Probit 的结果分析。以上结果也表明了本文所得结论是稳健可靠的。

表 4 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及地区差异对居民幸福感的 Bioprobit 回归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i>rass</i>	7.3e-5 ** (2.7e-5)					
<i>rfss</i>		3.4e-4 * (1.9e-4)				
<i>rhss</i>			-3.1e-4 *** (1.1e-4)			
<i>riss</i>				7.0e-5 ** (3.9e-5)		
<i>r_theil</i>					88.70 *** (25.94)	
<i>r_theil</i> ²					-3840.61 ** (1120.69)	
<i>r_theil</i> ³					96996.77 ** (26903.26)	
<i>r_theil3</i>						200.89 * (102.78)
<i>r_theil3</i> ²						-2641.42 ** (1349.09)

①CGSS2013 中提供了包含劳动就业、社会保障、低保、婚姻登记、基本养老等基本社会服务及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充足度及分布均衡度的数据,涉及宽口径社会保障内容的 55.56%,因此其与社会保障支出及其地区差异相关度较高。

②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与前文基本一致,为节省篇幅并未列出。表 4 中模型 5 所得一元三次方程的实根解为 -0.0688,与前文结果相近。

续表 4 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及地区差异对居民幸福感的 Bioprobit 回归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i>dissuffi</i>	-0.21 *** (0.03)	1.58 *** (0.23)	-0.57 ** (0.23)	3.32 *** (0.26)		
<i>disequil</i>					-47.53 *** (3.27)	-11.55 *** (1.83)
<i>disequil</i> ²					69.73 *** (4.45)	9.88 *** (1.19)
<i>disequil</i> ³					-31.46 *** (1.88)	
Obs	2 365	2 365	2 365	2 365	2 365	2 365
<i>atanhrho_12</i>	0.3657 ** (0.1490)	-0.4066 ** (0.1656)	1.1210 ** (0.4183)	-1.6600 * (0.4797)	-0.1302 ** (0.0631)	0.2047 ** (0.0677)
Log likelihood	-7476.68	-8909.88	-8483.63	-7240.35	-7995.66	-3272.17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 ***、**、* 分别表示在 1%、5% 及 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表 5 社会保障水平及地区差异对居民幸福感的 Bioprobit 回归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i>gass</i>	-20.93 *** (5.89)					
<i>gass</i> ²	71.44 ** (22.42)					
<i>gfss</i>		9.67 * (5.56)				
<i>ghss</i>			-151.48 ** (65.23)			
<i>ghss</i> ²			3214.17 * (1285.29)			
<i>giss</i>				-27.33 ** (11.32)		
<i>giss</i> ²				372.46 *** (103.97)		
<i>g_theil</i>					-41.68 *** (10.43)	
<i>g_theil</i> ²					310.74 ** (131.78)	
<i>g_theil</i> ³						1.26 ** (0.60)
<i>rgdp97</i>	-6.91 *** (0.44)	-1.18 *** (0.09)	-18.42 *** (0.51)	-18.41 *** (0.51)	-10.58 *** (0.44)	9.08 *** (0.55)
<i>rgdp97</i> ²	4.67 *** (0.19)		4.12 *** (0.12)	4.11 *** (0.12)	2.82 *** (0.10)	
Obs	2 365	2 365	2 365	2 365	2 365	2 365
<i>atanhrho_12</i>	0.1487 ** (0.0479)	0.4537 *** (0.0884)	-0.0248 (0.0358)	-0.0223 (0.0342)	0.0815 * (0.0460)	0.0627 ** (0.0313)
Log likelihood	-8148.74	-8755.82	-7811.29	-7792.93	-8466.49	-3202.17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 ***、**、* 分别表示在 1%、5% 及 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首先从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和社会保障水平两方面测算了社会保障支出的泰尔指数,并运用 CGSS2013 数据实证分析了社会保障支出及其地区差异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1)社会保障支出、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和社会保险基金支出人均值的提高显著提升

了居民幸福感,但人均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却不利于居民幸福感的提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城镇居民基本医疗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的提高有助于提升居民幸福感,因此主要原因还在于医疗保障供求结构间的矛盾以及医生职业环境的恶化。然而,社会保障水平有着不同的影响路径,除财政社会保障水平外,其他各项社会保障水平均与居民幸福感存在U型函数关系。(2)两种指标表征的社会保障支出地区差异与居民幸福感之间也存在着迥然不同的关系。人均社会保障支出的省际差异与居民幸福感之间为三次项非线性关系,三区域地区差异则呈现倒U型关系;社会保障水平省际差异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存在U型关系,三区域地区差异则促进了居民幸福感的提升。显然,这种错综复杂的影响路径给政府制定和执行相关政策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基于上述实证结论,我们得出如下政策启示:首先,社会保障支出的地区差异基本反映了各地区预算内的财政资金安排及保障职能的履行情况,但社会保障安排不能仅以当地人口基数为确定基础,还应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使经济资源更多地倾斜于社会保障。其次,坚持和完善社会保障支出政策,以居民幸福感和满意度作为社会保障支出的重要依据。需要注意的是,随着近年来中国基本医疗社会保障覆盖面的提高及制度完善,医疗保障供求间的矛盾以及多发的医疗纠纷、紧张的医患关系成为居民幸福感下降的主要原因。这意味着政府在继续加大医疗卫生投入的同时,鼓励并引导市场参与,有效解决医疗资源需求与供给的矛盾,加强医疗卫生领域的法治建设并完善相关监督机制,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同步提升医护人员和患者的幸福感。最后,应关注社会保障支出地区差异的合理区间。若越过临界点,认知和心理上的偏差会造成居民追求更高但无效的福利水平,落入福利陷阱。因此,各地区应合理安排社会保障资源,切实有效地提升居民幸福感。

参考文献:

1. 巴曙松、孔颖、吴博,2013:《我国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地区差异性的聚类分析》,《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第1—9页。
2. 蔡昉,2001:《劳动力迁移的两个过程及其制度障碍》,《社会学研究》第4期,第44—51页。
3. 陈炜、郭国庆、陈凤超,2014:《消费类型影响幸福感的实验研究述评与启示》,《管理评论》第12期,第45—54页。
4. 陈云松、张冀,2015:《城镇化的不平等效应与社会融合》,《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第78—95页。
5. 胡洪曜、鲁元平,2012:《公共支出与农民主观幸福感——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财贸经济》第10期,第23—33页。
6. 何立新、佐藤宏,2008:《不同视角下的中国城镇社会保障制度与收入再分配——基于年度收入和终生收入的经验分析》,《世界经济文汇》第5期,第45—57页。
7. 何强,2011:《攀比效应、棘轮效应和非物质因素:对幸福悖论的一种规范解释》,《世界经济》第7期,第148—160页。
8. 李涛、史宇鹏、陈斌开,2011:《住房与幸福:幸福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城镇居民住房问题》,《经济研究》第9期,第69—82页。
9. 刘斌、李磊、莫骄,2012:《幸福感是否会传染》,《世界经济》第6期,第132—160页。
10. 林江、周少君、魏万青,2012:《城市房价、住房产权与主观幸福感》,《财贸经济》第5期,第114—120页。
11. 彭海艳,2007:《我国社会保障支出的地区差异分析》,《财经研究》第6期,第90—100页。
12. 潘杰、雷晓燕、刘国恩,2013:《医疗保险促进健康吗?——基于中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第4期,第130—142页。
13. 孙三百、黄薇、洪俊杰、王春华,2014:《城市规模、幸福感与移民空间优化》,《经济研究》第1期,第97—111页。
14. 汤凤林、雷鹏飞,2014:《收入差距、居民幸福感与公共支出政策——来自中国社会综合调查的经验分析》,《经济学动态》第4期,第41—55页。
15. 王海成、郭敏,2015:《非正规就业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劳动力市场正规化政策的合理性》,《经济学

- 动态》第5期,第50—59页。
- 16.王少平、欧阳志刚,2007:《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度量及其对经济增长的效应》,《经济研究》第10期,第44—55页。
- 17.王延中、龙玉其,201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分析》,《财贸经济》第1期,第13—20页。
- 18.谢舜、魏万青、周少君,2012:《宏观税负、公共支出结构与个人主观幸福感:兼论“政府转型”》,《社会》第6期,第86—107页。
- 19.徐倩、李放,2012:《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差异与结构:1998—2009年》,《改革》第2期,第47—52页。
- 20.于席正、江莉莉,2012:《试论消费决策与幸福:动机—精神力场—行为假说》,《经济学(季刊)》第3期,第969—996页。
- 21.杨燕绥,2011:《社会保障》,清华大学出版社。
- 22.郑风田、阮荣平、刘力,2010:《风险、社会保障与农村宗教信仰》,《经济学(季刊)》第3期,第829—850页。
- 23.周钦、袁燕、臧文斌,2015:《医疗保险对中国城市和农村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经济学(季刊)》第3期,第931—960页。
- 24.张展新、高文书、侯慧丽,2007:《城乡分割、区域分割与城市外来人口社会保障缺失——来自上海等五城市的证据》,《中国人口科学》第6期,第33—41页。
- 25.Ashraf, Q., and O. Galor. 2013. “The ‘out of Africa’ Hypothesis, Human Genetic Diversity, and Compara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1):1–46.
- 26.Brickman, P., and D. T. Campbell. 1971. “Hedonic Relativism and Planning the Good Society.” *M. h. hapley Adaptation Level Theory* 54(3):1–9.
- 27.Börsch-Supan, A., and Hendrik Jürges. 2006. “Early Retirement, Social Security and Well-being in Germany.” NBER Working Paper 12303.
- 28.Clark, A., and A.J. Oswald. 1996. “Satisfaction and Comparison Incom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61(95): 359–381.
- 29.Clark, A., and M. A. Shields. 2008. “Relative Income, Happiness, and Utility: An Explanation for the Easterlin Paradox and other Puzzl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6(1):95–144.
- 30.Dinner, E., and M. Seligman. 2004. “Beyond Money:Toward an Economy of Well-being.” *Psychological Scienc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5(1):1–31.
- 31.Di Tella, R., and R. MacCulloch. 2006. “Some Uses of Happiness Data in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25–46.
- 32.Dolan, P., T. Peasgood, and M. White. 2008. “Do We Really Know What Makes Us Happy? A Review of the Economic Literature on th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Subjective Well-being.”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29(1):94–122.
- 33.Easterlin, R.A. 1974.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In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Edited by P. A. David and M. W. Reder, 89–125.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34.Ferrer-i-Carbonell, A., and X. Ramos. 2014. “Inequality and Happiness.”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28(5): 1016–1027.
- 35.Ferrer-i-Carbonell, A., and P. Frijters. 2004. “How Important Is Methodology for the Estimates of the Determinants of Happiness?” *Economic Journal* 114(496):641–659.
- 36.Franz, B., and C. Anna. 2014. “The Impact of Truancy o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during Compulsory Schooling: A Bivariate Ordered Probit Estimator with Mixed Effects.” *Manchester School* 82(1):103–127.
- 37.Frey, Bruno S., and A. Stutzer. 2002. “Happiness and Economics: How the Economy and Institutions Affect Well-being.” *Contemporary Sociology* 159(3):435–436.
- 38.Frey, Bruno S., and A. Stutzer. 2007. “Should National Happiness Be Maximized?” Zurich IEER Working Paper, No.306.
- 39.Frey, Bruno S., and J. Gallus. 2013. “Political Economy of Happiness.” *Applied Economics* 45(30): 4205–4211.
- 40.Fuster, L. 2003. “A Welfare Analysis of Social Security in a Dynamic Framework.”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44(4):1247–1274.
- 41.Greene, W. H., and D. A. Hensher. 2010. *Modeling Ordered Choices: A Prim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42.Hayward, R. D., and M. Elliott. 2014. “Cross – National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Norms and Government Restriction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n and Well-being.” *Review of Religious Research* 56(1):23–43.

- 43.Helliwell,F.,and H.Huang.2008.“How’s Your Government? International Evidence Linking Good Government and Well-being.”*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8(4):595–619.
- 44.Helliwell,F.,H.Huang,G. Shawn, and Shun Wang.2014.“Empirical Linkages between Good Government and National Well-being.”NBER Working Paper 20686.
- 45.Hessami,Z.2010.“The Size and Composition of Government Spending in Europe and Its Impact on Well-being.”*Kyklos* 63(3): 346–382.
- 46.Kahneman,D., and P. P. Wakker.1997.“Back to Bentham? Explorations of Experienced Utility.”*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2(2):375–405.
- 47.Kahneman,D., and A. B. Krueger.2006.“Developments in the Measurement of Subjective Well-being.”*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3–24.
- 48.Kimball,M.S.,R.Nunn, and D.Silverman.2015.“Accounting for Adaptation in the Economics of Happiness.” NBER Working Papers 21365.
- 49.Kotakorpiw,K., and Jani-Petri Laamanen.2010.“Welfare State and Life Satisfaction: Evidence from Public Health Care.”*Economica* 77(307):565–583.
- 50.Lei,Xiaoyan, and Wanchuan Lin.2009.“The New Cooperative Medical Scheme in Rural China: Does More Coverage Mean More Service and Better Health?”*Health Economics* 18(Supplement 2):S25–S46.
- 51.Malesevic Perovic,L., and S.Golem.2010.“Investigating Macro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Happiness in Transition Countries: How Important Is Government Expenditure?”*Eastern European Economics* 48(4): 59–75.
- 52.Ott,J.C.2011.“Government and Happiness in 130 Nations: Good Governance Fosters Higher Level and More Equality of Happiness.”*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02(1):3–22.
- 53.Ouweneel,P.2002.“Social Security and Well-being of the Unemployed in 42 Nations.”*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3:167–192.
- 54.Sajaia,Z. 2008.“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of a Bivariate Ordered Probit Model: Implementation and Monte Carlo Simulations.”*The Stata Journal* 4(2):1–18.
- 55.Scitovsky,T.1972.“What’s Wrong with the Arts Is What’s Wrong with Socie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2(2):62–69.
- 56.Shorrocks,A.F.1980.“The Class of Additively Decomposable Inequality Measures.”*Econometrica* 48(3):613–625.

Social Security, Regional Disparity and Happiness

Yin Jinpeng¹, Zhao Chunling², Jia Zhanbiao¹ and Ni Zhiliang¹

(1:School of Economics,Nankai University;2:School of Marxism,Nankai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gional disparity of China’s social security expenditure in social security expenditure per capita and social security level, and uses CGSS 2013 data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social security expenditure and its regional disparity on Chinese residents’ happines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1) Social security expenditure per capita, public expenditures per capita, and social insurance fund expenditure per capita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residents’ happiness, but health expenditure per capita reveals a negative influence. Social security level of finance is non-significant, but other variables show U-shaped relationship. (2) There is three cub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sparity of provincial social security expenditure per capita and residents’ happiness, but there exists the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ree-regional disparity of social security expenditure per capita and happiness. And it is an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vincial social security level and happiness, but the three-regional social security level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The different paths would hamper policy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effectively.

Keywords: Social Security Expenditure,Regional Disparity,Happiness,Theil Index

JEL Classification: C25,H55,I31

(责任编辑:彭爽)